

对话：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上）

杜维明 精神人文主义 Spiritual Humanism 阅读量：353

导读：本文是杜维明先生于2013年第三届“中英马克思主义美学双边论坛”次日所作的一次访谈，主题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交流与对话，但访谈所涉内容十分广泛。对谈双方从马克思主义如何与儒家会通从而超越启蒙哲学谈起，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困境与可能性进行了探讨，根本关切则在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问题和未来道路。

本文选自《杜维明访谈集（21世纪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分为上下篇推送，小标题为编者自撰。

马克思主义与人文主义

王杰：今天是2013年4月8日，上海交通大学的校庆日，也是我们第三届“中英马克思主义美学双边论坛”进行的第二天，那就让我们从这个论坛开始谈起吧。据说当年唐文治校长将4月8日定为校庆日，是取“四通八达”之意，今天关于我们这个论坛的主题、论坛的组织形式，特别是您昨天的演讲涉及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怎样在新的条件下去对话、去形成一种新的建设性的文化力量，我想先请您进一步谈谈这个问题。

杜维明：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我完全没有想到，在安德森教授以及其他几位教授的主题发言中，人文精神，当然也就是人文主义（Humanism），现在变成那么重要的观点。在以前，从解构学来看，不管是阿尔都塞、福柯还是德里达，基本上都是在批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之前萨特曾经用过人文主义，但有一度，萨特作为一个革命论的学者，对人道主义似乎不再关注了，可是萨特到了晚年，特别对“Brotherhood”，这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东西加以重视。另外，他还突出了“The Man”，大写的人，就是说在所有的人类的基础上还有个“人”的观念。我觉得就像儒家“仁爱”的“仁”一样，“仁”既有主体性，同时又有社会性，还有人和自然的关系、和天道的关系，所以说是一种宽广整合而且具有精神性的人文主义，我觉得现在来谈这种人文主义，具体地说是落实孟子“本体”、陆象山“本心”和王阳明“良知”的心学的时机到了。

王杰：对，现在是我们重新思考与人道主义、与人性相关的许多问题的时候了。

杜维明：的确如此，就像安德森他们对此也极为关注。先不说宗教，因为宗教是有争议的，但是精神性或者宗教性应该没有争议。意思就是说现在兴起的马克思人文主义和儒家的人文主义能够配合，就是要超越启蒙哲学一直发展下来的这样一种凡俗的、反宗教的、反精神价值的、过度功利、过度物质化、对自然有过度的侵略而且过度强调人类中心主义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受到西方很多杰出思想家，包括女性主义、生态环保、社群伦理、文化多样、宗教多元等学者的批判。他们尝试一种新的人文视域，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人和地球必须设法建立的一种新的关系。关爱地球，成为所有宗教传统的共识。就基督教而言，你不能说未来的天国比现在，也就

是凯撒的世界，更应当受到我们的关怀，因为你必须要在凯撒的世界里面改变你自己。就佛教徒来说，不能说净土和彼岸更重要，佛教徒必须要入世而转世，所以一般来讲，中国讲的佛教徒就是人生佛教（太虚）、人间佛教（印顺）乃至人间净土（星云、圣严和证严）。我觉得儒家在这方面和马克思的思想有很能够配合的地方。也就是说，儒家基本上说是“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我就是在这个世间里。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实践，就是为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不公平的社会结构做一个彻底的、批判性的解构。所以，他主要的意思就是我来这个世界不仅仅是去反映，而是要去改变。

王 杰：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就是要去改变世界。

杜维明：儒家讲“为己之学”，“为己之学”的这个“为”（第四声）后来被荀子讲得更极端一点，就是在今天会引起误会的“为”（第二声），即“为之”，“为”就是要由人来塑造、人来创造，所以在这个精神上，我觉得马克思主义与儒家学说有很多近似和交融的地方。

超越斗争哲学

王 杰：其实在这次会议上，我也觉得很兴奋。我们的论坛去年在曼彻斯特讨论的主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我们当时主要着眼于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同时也讨论了莫里斯、马尔库塞、朗西埃等人的美学思想，但是对于“当下性”，去年讨论得并不多。应该说，在本次会议上，各位学者是在去年的话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讨论的。我认为，在当代的中国社会和当代的世界，有关人道主义和人性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可能这还与我们现在所考虑的核心价值观等等都有关系。因为在马克思主义这个传统之下，受到“文革”的影响，比如说“文革”过后，国内学术界对《手稿》的讨论，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分歧。关于“两个马克思”的问题，即“青年马克思”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讨论，这种情况其实受阿尔都塞学派的影响很大。这个影响的消极方面可能是过重了，也就等于说是误解了马克思，我本人觉得一些学者也没有真正地理解阿尔都塞，其实阿

尔都塞还是有所指的。当然，阿尔都塞本身也有偏颇的地方。

杜维明：阿尔都塞，作为一个人而言，也就是从儒家修身哲学或希腊精神磨炼的角度来观察，在日常生活的行为，有的地方其实是很可怕的，因为这里面有严重的暴力问题。就中国的经验来说，我基本上认为，在 19 世纪，甚至在 20 世纪初，斗争、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是必须要有的。因此，进行得越全面、越彻底，越能够把不合理的现象弄清楚就越好。可另外我们也了解到，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斗争或者说竞争，必须摆在一种更宽广的、合作关爱的信仰之上。所以我觉得，就马克思主义而言，如果说青年马克思在很多地方有着非常宽广的人文视域，乃至所谓受人文思潮激发的存在感受，那么，就列宁所理解的马克思来说，当然我的这个研究是很片面的，今天我们所认为的马克思的宗教观其实并不是马克思的，而是列宁的，而列宁对宗教是没有任何正面的肯定的。

王 杰：马克思对宗教实际上是有正面肯定的。

杜维明：不仅如此，因为马克思是犹太人，作为一个犹太人，说他不懂宗教是不可能的，他有他的宗教的敏感度。但列宁所代表的是一个没有宗教情怀的革命理想，这是第一点。另外的一点是大家现在批评得非常厉害的一个概念，所谓“State of Marxism”，就是国家马克思主义，也就是斯大林主义。如果讲得再具体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有这一面向，它一方面是使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现实相结合，但另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有一些负面的因素，站在历史分析的角度看，大半都属于“土改”那个时候的情况，我们需要对这一阶段做详细的个案调查与研究。

王杰：“土改”里面其实有很多问题，我们人文学院有一个研究团队，在重新研究那一段的历史，他们是从基层组织的档案收集入手的。

杜维明：不仅有很多问题，大概案例也上千了。比如说，有一位专门从事土改研究的法国学者，卢西恩·比安科（Lucian Bianco），他是一位严格的扎根具体事实分析的杰出学者，他认为“土改”中百分之七八十以上都是没有必要的，不少是地痞流氓把原来相对和谐的社会破坏掉了。

王杰：对，很多乡绅等等都受到影响，其实他们当时是代表着中国文化底层的某种社会力量，包含着某种正面的东西。

杜维明：的确，我认为这是完全对的。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要重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是它有正面和负面两个方面。对它的负面，我们要摒弃。所以说，我觉得改革开放以来，在哲学思想上最伟大的发展就是彻底放弃斗争哲学那个阴暗面。一直以来，从斗争哲学到科学发展观，我们说是可以的，甚至到现在提出和谐。和谐的意思就是：发展所带来的矛盾和冲突，以及过分的物质化、商品化、过分狭隘的一种功利的思想，都要被重新转化，这就要把中国传统中最深厚的那个文化，还有它以前能够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等等这些力量，慢慢地恢复起来，这是中华民族自我救赎必须要经历的。

王杰：这的确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说现在，我觉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是如您刚刚所讲，是有偏颇的，另一个方面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完成的过程。

杜维明：可以说，按照哈贝马斯的方法，整个启蒙不仅是一个心态，一个运动，而且还是一个没有完成的计划。关于启蒙心态的问题，我和衣俊卿曾做过讨论，发表在《求实》杂志。他治学严谨，有深入探讨理论的热忱，但我认为他过分认同启蒙心态，这是有问题的。因为现在在中国，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半都是完全认同启蒙的，可是这就存在一个对于启蒙的负面怎么批判的问题。刚才我们讲了，启蒙有人类中心主义倾向，有非常强烈的浮士德的征服自然的心态，它突出理性、自由、权利、法治等核心普世价值，但对同情、慈悲、正义、责任、和谐等核心价值，一般说是扎根亚洲的普世价值则掉以轻心了。对于这些课题，一个真正认同马克思主义或者启蒙心态的人要有所自觉。因为我们处于什么样的问题中呢，严格地说，从“文革”以来，那些残害人的、那些真正应该被绳之以法甚至要治罪的人，他自己现在有极大的话语权，有了权威性，但没有任何的自责自疚。而那些被残害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在西方受教育非常好的知识分子，完全可以算是被牺牲的人，他们却产生了强烈的罪

恶感和强烈的不安全感。一直到今天，那些“整人”的人，其气焰仍然很盛，“被整”的人不仅没有感觉到需要对那些人绳之以法或者诉诸正义，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自责自咎并不合情合理。

在这点上我觉得，需要做什么呢？——讲起来又是政治不正确。我们要学南非，结束种族歧视以后，由曼德拉、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Mpilo Tutu）提出来一个叫做“True and Deconciliation”，真理和饶恕、宽恕或者是解脱、解救的口号。那么对我们的意思就是说首先要把从“文革”以来、甚至更早以前，真正的社会上的不公平、残忍的阴暗面，把真相完全地公之于世，让大家都知道。用林肯的话讲，我们对任何人都是仁慈的，我们不是要用这些例子来整人，黑暗的时代已经过了。我们现在是，即使你再糟，只要你把事实讲出来，也有你生存的空间，而且有你的人格尊严。但前提是这个事情要摆出来，我们现在需要对这个事情做一个深刻的反省，对自己的民族、对自己的文化、对自己的人性，都应该重新反思。

历史意识与现实关切

王 杰：对“土改”、对“文革”都应该放在现在的学术背景下重新反思。

杜维明：不能忘记！对于一个民族，没有历史记忆就没有自由，更不要说是还能够发展。我们现在气很不顺的时候，应该做些工作把我们的气弄顺，在这个时候，这个问题不是经济、政治可以解决的，而要由文化来解决，要在文化上医治一些最深刻的心灵的沧桑，要给予他们终极关怀。现在 80 岁或者 90 岁的人，他的心灵的沧桑若不被医治，那他在临死的时候那种忿恨不平之气是不会消解的。对于一个民族而言不能这样，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更是如此。更难得的是我们这个民族是世界上有古有今，而且历史记忆最长的、记录资料最全面的民族之一。

王 杰：是的，中华民族虽然饱经沧桑，但是一直延续下来，保有最完整的历史，这是很了不起的。

杜维明：可是现在却患了健忘症，忘却、主动的忘却，一个民族落到现在这种程度很窝囊。

王 杰：我觉得这是现存的一个很大问题。我们这次会议真的很有意思，马克思主义这一学派的学者与像您这样的对中国文化有很精深的研究的学者来进行对话。我想，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怎么样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重新焕发出来，这个太重要了，不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很难赢得国际学术界的尊重。我举一个例子，德里克是很著名的一个研究中国的学者，也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关于来参加我们的论坛，他曾给我写过邮件，说他还是有顾虑的。他觉得如果他来参加会议，会对中国的现实有所批判，这样可能会不方便，所以他最后就没有来。我就在想，在今天这个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怎么样在当代去发展，怎样面对当代的社会现象和理论问题？

杜维明：这一点太重要了！

王 杰：因为就批判性这个维度而言，我们一讲批判性，就讲革命、讲革资本主义的命，却没有讲过对自己的反省。对自己的整个现代化过程经历中，哪些地方是极“左”的，哪些地方是有偏颇的等问题的研究，其实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关口。

杜维明：完全绕不过去。而且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对于马克思的人道精神，所谓社会主义的异化这些问题，在 80 年代提出过，结果挨批得多惨。也想想那个时候，汝信，还有王元化、王若水都参加过这一工作。那时提出的观点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假如你不去谈——你看现在最高领导都公开谈，如果不好好地把贪污腐化，包括异化、贫富不均的现象加以重视，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呢？还有在网上，只要发表言论，都是一种愤恨不平，没有真正能够静下来进行理性的辩难和思考问题。

王 杰：其实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的文化，这样的心态很不好，很不利。

杜维明：很不利。不仅如此，对于有些区域来说，它们支持我们，因为它们的存在是要靠我们的。比如香港，就港人一般的态度而言，你会说好，但是还存在一些很极端的、反一切权威的思想，这对港人和大陆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利。现在说两岸的关系很好，但是马英九碰到的是台湾政治文化中无法绕过去的关于“国家认同”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不可能很短时间解决的。再比如说，和日本，和美国，和周边所有其他的国家之间，如果你要讲你自己国家的主权，人家也要讲人家的主权，一寸土你不要放弃，人家也一寸土不要放弃。在这个处境里，一个伟大的民族、伟大的国家，应该有处理这种国际关系中微妙问题的能力。

另外一点而言，我们并没有一个模式。不要说我们走出了一条模式，我们还没有。我们走的是一条道路，我们有的是一种经验。我们的经验有好有坏，而且往前看，这条路要走出来是有困难的。在经济上能走出一条路来吗？能够让其他的金砖四国学习吗？在政治上我们有一条路吗？在文化上，我们现在并不是大国，或者说，我们文化上的力量太薄弱了。此外，我们所考虑的价值领域太稀少了，除了政治、经济以外，我们在其他问题上都没有什么发言权。哲学没有发言权，文学没有发言权，曾经多么辉煌的历史，一个那么伟大的民族弄到今天这步田地，可以说，我也觉得有一点悲伤吧。所以就心情而言，我们应该有一种悲愤，这算忧患意识，如果没有这种忧患意识，不要说学术站不起来，你的国家民族也站不起来，我们现在就是这样情况。

所以说，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工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儒家、对我们的核心价值要透视，要关怀，要去研究。同样，从事儒学研究的这批人，必须要了解到马克思主义里面有一些可以和我们合作的空间怎么开发。双方都要对中国的现实进行非常严厉而全面的批判的认识与反思。这本来是我们的看家本领，我们不努力培养基本功怎么行呢。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ezKfAYnlHszMWCnnfUER1w>